

---

## 二十一世紀臺灣「後」殖民女性小說： 以《看得見的鬼》、《海神家族》 與《婆娑之島》為例

馮品佳<sup>1</sup>

**摘要：**由於臺灣的多重殖民歷史，「後」殖民書寫一直是臺灣當代文學重要的一支。本文從臺灣本土的「後」殖民論述入手，爬梳臺灣的「後」殖民論述的種種爭議，進而分析李昂的《看得見的鬼》(2004)、陳玉慧的《海神家族》(2004)、以及平路的《婆娑之島》(2012)等三部小說，探索二十一世紀臺灣「後」殖民女性小說的再現策略。綜言之，經過二十世紀末以來理論辯證，臺灣的「後」殖民論述已經發展出自己的脈絡，而臺灣作家也持續以豐富的文學創作，建構出具有臺灣歷史地理文化獨特性的「後」殖民傳統。

**關鍵詞：**「後」殖民主義、李昂、陳玉慧、平路、《看得見的鬼》、  
《海神家族》、《婆娑之島》

---

<sup>1</sup> 交通大學講座教授兼亞裔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講座主持人。

**(Post)Colonial Taiwanese Women's Fic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ases of *Seeing Ghosts*,  
*Mazu's Bodyguard*, and *Ilha Formosa***

Pin-chia Feng<sup>2</sup>

**Abstract:** Multiple layers of colonial history in Taiwan have nurtured a strong interest in (post)colonial literary works, as evidenced by the writing, and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first identifies important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related to (post)colonial discourse in Taiwan's academic circles. It then moves on to analyze the fictional works of three women writers—Li An's *Seeing Ghosts* (2004), Jade Y. Chen's *Mazu's Bodyguards* (2004), and Ping Lu's *Ilha Formosa* (2012) —to explore the various strategies through which Taiwanese women writers represent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of the island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aiwanese literary scholars, as well as creative writers,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geo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 specific (post)colonial discourse afte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productive debates and discussions.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women's fiction, Li An, Jade Y. Chen, Ping Lu, *Seeing Ghosts*, *Mazu's Bodyguards*, *Ilha Formosa*

---

<sup>2</sup> Chair professor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National Chaio Tung University, National Chair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 一、前言

「後」殖民這個詞彙本身就具有時間性與相對性。「後」不但標誌了時間的先後順序，也指出在思考「後」殖民情境時，相對的座標依據是殖民、甚至於前殖民情境。然而，此處將「後」殖民特別置於引號之內，則意在表達殖民行為其實一直持續不斷，很難清楚地在時間軸線上劃分出絕對的界線，或許「延續體」(continuum)的概念才能更適當地形容其綿延性。<sup>3</sup>事實上，殖民主義即是人類歷史的常態，自從人類自許為萬物之靈，將地球的其他生物都視為人類的附屬品或是人類的供需物開始，就持續發生各式各樣的殖民行為。晚近興起的生態主義論述與動物研究等等，即旨在批判由於人類中心主義所造成的種種生態與生物浩劫。歷史上不同帝國的建立與擴張，也是殖民行動的結果。今日我們討論殖民與「後」殖民的問題，往往以歐洲殖民主義為主要批判對象，卻忽略了在人類演化過程中不斷產生的殖民行為。不過，要討論對於現今人類世界局勢影響最大的殖民活動，應該還是回溯到十五世紀開始的歐洲大航海時代。當時的各種令歐洲人雀躍的地理「大發現」，造成數百年來歐洲海權國家對於世界上其他地域的殖民霸權，以及即使脫離政治

---

<sup>3</sup> 陳芳明是從被殖民者抗拒的角度將「去」殖民或「抵」殖民也納入「後」殖民的延續體中：「所謂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 的『後』，並非是指殖民地經驗結束以後，而是指殖民地社會與殖民統治者接觸的那一個時刻就開始發生了。對於殖民體制的存在，殖民地作家無不採取積極的抗爭（如批判），或消極的抵抗（如流亡、放逐）。因此，這裡的『後』(post)，強烈具備了抗拒的性格。」見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臺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38。

殖民之後所揮之不去的殖民魅影，使得「後」殖民似乎總是一個難以達到的夢想，而曾經遭受殖民地域的人民總是處於模稜兩可的中陰之境，而「後」殖民書寫也成為重要的文學類型。

就臺灣本土的情境而言，「後」殖民論述有相當複雜的脈絡。一方面是本土多重殖民歷史所造就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則是二十世紀末期歐美相關理論輸入所引發的思想辯證，再加上臺灣的政治情況，即使在新的世紀依然引發爭論。這是臺灣文學研究重要的主題，也是臺灣比較文學重要的議題，不僅包括理論的旅行與在地影響，也就是歐美理論的逡譯與轉換以及本土學者的接受與抗拒，也牽涉到本土不同學門之內的互動，以及本土學者在國際學術場域討論臺灣「後」殖民性與文學再現，試圖回饋並轉變「後」殖民論述。由於臺灣「後」殖民論述的複雜性超出本文所能處理，在此將聚焦於臺灣的「後」殖民論述的爭議，並且以李昂的《看得見的鬼》（2004）、陳玉慧的《海神家族》（2004）、以及平路的《婆娑之島》（2012）等三部女性小說為例，討論對於「後」殖民情境不同的再現策略。

## 二、臺灣文學研究的後殖民理論回顧

本文以「後」殖民之爭議為主，是因為多方批判理論的衝突恰好展現了「後」殖民原本具有的多重矛盾；至於以女性小說為主，除了筆者自己對女性主義的關懷之外，更是因為女性在傳統父權社會處於邊緣，這個性別的邊緣處境卻是探討殖民主義及其遺緒如何邊緣化被殖民者極有利的戰略位置。同時，筆者也是有意回應邱貴芬在〈臺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一文中所言，臺灣女作家雖然活躍創作，卻在臺灣文學史中未受到相對的反映，「……這麼

豐沛的女性創作不入史，長久以後，終將煙消雲散，埋葬在臺灣文學歷史的陰暗角落」。<sup>4</sup> 文學研究者左右著文學史的走向，筆者對於臺灣「後」殖民女性小說的研究雖然只是初探，也希望能為女性作家在臺灣文學史上爭取應有的認可。

有關臺灣「後」殖民研究的理論方面，本文要從廖炳惠（Ping-hui Liao）於 1999 年在《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所發表的論文〈臺灣的後殖民研究：批評辯論的爭議點〉（“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以及劉亮雅在 2011 年發表於《現代語文研究學會會刊》（*PMLA*）的〈臺灣後殖民小說〉（“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入手，觀察臺灣學者在著名的國際期刊就「後」殖民的議題向國際學界所傳達的訊息。廖炳惠在論文中指出，臺灣「後」殖民研究的爭議來自學者對於臺灣究竟何時進入「後」殖民時期的意見不一：「正統的觀點是，1945 年日本統治結束，臺灣已經進入後殖民。然而，對於臺灣許多學者與知識份子而言，1945 年誌記著悲劇的開始，國民黨的內部殖民的另一個五十年伊始於此。對於新黨以及統派的國族主義者而言，臺灣仍舊無法脫離日本殖民的遺緒以及美國新殖民主義」。<sup>5</sup> 他也提及陳芳明的論點，認為 1989 年李登輝主政開始臺灣方才進入後殖民時期。<sup>6</sup> 因為臺灣內部不同的政治立場，對於臺灣「後」殖民的認知也各異，因此，廖文指出「想要充分敘述臺灣的後殖民情境，我們必須

---

<sup>4</sup> 邱貴芬：〈臺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頁 21。

<sup>5</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ostcolonial Studies* 2.2 (1999), p. 199. 中文為筆者翻譯。

<sup>6</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p. 206-207.

考慮多重且相互衝突的集體性與時間性」。<sup>7</sup> 廖炳惠隨即提供了臺灣外文學界在引介「後」殖民理論時的兩個主要的辯論。其一是 1992 年邱貴芬與廖朝陽就臺灣語言中的能動性所引發的辯論；<sup>8</sup> 其二是 1995 年廖朝陽與廖咸浩在《中外文學》的後現代與後殖民辯論，以及臺灣作家在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擺盪。<sup>9</sup> 廖炳惠認為邱貴芬所提出的後殖民主義是逐步邁向後現代主義，不足以表述臺灣與中國相關的殖民與後殖民歷史。<sup>10</sup> 廖文最後以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為例，指出二十世紀初年臺灣知識份子在日本與中國文化之間旅行與翻譯，最後陷入既非日也非中的困境。因此，廖炳惠主張應該結合歐美的後殖民理論與「另類『後』現代性」（alternative [post-]modernity）來重新敘述臺灣的殖民與後殖民歷史。<sup>11</sup>

劉亮雅的〈臺灣後殖民小說〉以 2009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訪臺的座談會爭議切入，批評主辦單位中研院為了討好中國，臨時將與談人從李昂換成朱天文。劉亮雅主張「李昂是後殖民作家，而朱天文則是以後現代主義對抗後殖民。籌劃會議的研究員彭小妍棄李而用朱，是以朱的中國中心臺灣觀點，對抗一個過去二十年來因為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因而冒現的強烈臺灣意識。彭的

---

<sup>7</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 200.

<sup>8</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p. 201-204.

<sup>9</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p. 204-208.

<sup>10</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p. 208-209.

<sup>11</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p. 209-210.

做法與當前的親中的國民黨政府調性一致。某種程度上這個政府是因為假裝親臺因此贏得 2008 年總統大選」。<sup>12</sup> 這段毫不掩飾政治立場的開場，將臺灣的「後」殖民議題又拉回到 1992 年與 1995 年的辯論，而且將文學創作、學術場域、與政治鬥爭完全混合，展現十足獨派的火力，也藉之導引出她對臺灣後殖民小說的定義：「臺灣後殖民小說批評國民黨殖民臺灣，對抗它所提出的臺灣官方歷史，並且從與臺灣認同及臺灣的殖民過去之相關性，處理諸如性別、種族、階級等議題」。<sup>13</sup> 特別的是統治臺灣五十年的日本則在這個「後」殖民的框架中完全開脫，因為對於劉亮雅而言，在臺灣意識抬頭之際，「臺灣民族主義者曾經以日本的殖民遺產對抗國民黨的內部殖民」。<sup>14</sup> 除了追憶國民黨統治所造成的歷史創傷，劉亮雅認為臺灣的後殖民小說所要處理的另外兩個主題則是原住民母語及歷史追據（reclaim）的計畫，<sup>15</sup> 以及對抗新殖民主義，<sup>16</sup> 並且以李昂的《迷園》、

---

<sup>12</sup> 原文參見 Liang-ya Liu,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MLA* 126.3 (2011), p. 678。劉亮雅在她 2006 年的中文專書《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中雖然也認為「外省作家」經常採取後現代的立場，但是也認為解嚴之後的臺灣小說是後現代與後殖民夾雜，並無非難後現代作家之意。她也認為「後現代與後殖民的並置、角力與混雜，不僅可以描繪解嚴以來臺灣主導文化的思想氛圍，以及解嚴以來臺灣小說的主題意識，同時也可以描繪這些小說裡的新美學。也就是說，文化思想、主題意識和新美學三個層面都展現出後現代與後殖民的並置、角力與混雜」。見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39。這樣持平的論述在〈臺灣後殖民小說〉一文中則完全被政治意識形態所取代。

<sup>13</sup> Liang-ya Liu,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 679. 中文為筆者翻譯。

<sup>14</sup> Liang-ya Liu,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 679.

<sup>15</sup> Liang-ya Liu,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 681.

<sup>16</sup> Liang-ya Liu,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 683.

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與田雅各等人的書寫，舞鶴的《餘生》，以及施叔青的《微醺彩妝》做為文本例證。

基本上廖炳惠與劉亮雅的英文論文都在介紹臺灣的「後」殖民研究，兩人的政治立場相同，都認為李登輝主政時代的「安靜革命」——廖炳惠使用的是“calm revolution”而劉亮雅則是使用“quiet revolution”——<sup>17</sup>造成了本土化與臺灣國家認同策略性的含混，<sup>18</sup>結束了「親中的威權統治」。<sup>19</sup>廖文的重點除了 1992 年以後的外文學界的爭議之外，更強調需要檢視臺灣的殖民與後殖民歷史如何受到日本與中國帝國遺緒的影響，重新定義歐美的「後殖民主義」。<sup>20</sup>劉亮雅論文最重要的貢獻，則在於強調原住民在臺灣後殖民論述的重要性。畢竟，在臺灣生存超過八千年的原住民，自從漢人移民在四百多年前渡過黑水溝來臺開墾以來，已經遭受太多剝削與屈辱，筆者深信臺灣原住民才是最終極的殖民主義受害者，時至今日也始終並未達到「後」殖民的地步。

回到臺灣本土的學術書寫脈絡之中，或許可以更細部地探討廖炳惠與劉亮雅為國際學界所描繪出的臺灣「後」殖民輿圖。臺灣文學研究的權威學者陳芳明在《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一書的〈自序〉中提及臺灣「後」殖民研究的「遲到」，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來自國內的阻力，戒嚴時期對於臺灣研究的壓制，「戒

---

<sup>17</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 201; Liang-ya Liu,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 679.

<sup>18</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 201.

<sup>19</sup> Liang-ya Liu,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 679.

<sup>20</sup> Ping-hui Liao,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 209.



嚴體制本身，就是一種變相的殖民體制。它對臺灣歷史、文學、語言、文化等等刻意壓制與扭曲，造成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停留於缺席狀態」，並且造成「臺灣歷史淹沒在龐大的中國論述之中」。<sup>21</sup> 另一原因則是「強勢的中國論述長期蒙蔽並阻撓臺灣的後殖民視野」，使得國際學界「無法分辨臺灣歷史經驗與中國歷史經驗有何不同」。<sup>22</sup> 在〈後殖民或後現代——戰後臺灣文學的一個解釋〉中，陳芳明更提出以「再殖民時期」替代「戰後時期」，來看待 1945 年之後從日本殖民解放的臺灣社會。<sup>23</sup> 因此，根據陳芳明所提出的臺灣殖民／「後」殖民時間表，日據時期為殖民時期，1945 年以後為再殖民時期，而 1987 年解嚴以後則是後殖民時期。<sup>24</sup> 他也指出解嚴暴露了臺灣社會內部權力結構嚴重的不平等，認為解嚴之後「要求權力的再分配，要求價值的多元化」的訴求「既是去中心的，更是去殖民的（decolonization）」。因此，女性、同志、眷村、原住民等紛紛尋求解放的行動，並不是等到後現代主義思潮引介至臺灣之後才陸續開始，而是由於再殖民的戒嚴體制之終結，使許多受到禁抑的欲望陸續獲得鬆綁。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各個弱勢族群採取的策略容或與後現代精神有不謀而合之處，但其終極目標絕對不是主體解構，而是主體重構。更確切地說，這種多元價值體系的追求，乃是從臺灣歷史的脈絡中發展出來的，絕對不是受到後現代精

21 陳芳明：〈自序〉，《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12。

22 陳芳明：〈自序〉，《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14。

23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臺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28。

24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臺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38。

神紮根的影響。<sup>25</sup> 陳芳明將女性、同志、眷村、原住民社群納入「後」殖民的範疇固然可能引起爭議，也可能遭到批評，以多元文化主義取代了去殖民行動。但是他強調臺灣具體的歷史經驗脈絡所發展出的「後」殖民論述，以便走出「後殖民」與「後現代」的對峙與爭議，最終的目的是提供後現代主義文本在臺灣「後」殖民文學一個立足之地。

外文系出身、致力於臺灣文學研究的邱貴芬則在〈「後殖民」的臺灣演繹〉一文中仔細回顧了臺灣後殖民理論的幾番辯論及其意義。她強調有別於 1960 年代西方現代主義理所當然的橫向移植，1990 年代外文學者對於引介西方後殖民理論時對於接受歐美理論所「隱含的殖民架構」其實十分具有自覺性，<sup>26</sup> 帶有「『後現代式』的自我批判姿態」，但也「反映了臺灣論述界無法自外於歐美（後現代）學術風潮的影響，隱然表達了臺灣深植於『新殖民』論述結構的位置，臺灣的『後殖民』和『後現代』議題顯然不是可以那麼截然劃分，涇渭分明」。<sup>27</sup> 關於 1992 年她與廖朝陽在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場內與場外的辯論，邱貴芬指出她援引巴巴（Homi Bhabha）「文化混種」（hybridity）與「學舌」（mimicry）的概念，「主張臺灣國語可視為『臺灣的』語言，用來做為不同母語族群的溝通工具」，而主要論述立場「是贊成本土運動但卻反對『本土』被約化為『福佬』以及本土運動潛在的『福佬沙文』傾向」，但是也接受廖朝陽批評她「淡化了殖民歷史情境裡語言和文化的殖民暴力問

<sup>25</sup>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臺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41。

<sup>26</sup>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59。

<sup>27</sup>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60。

題」。<sup>28</sup> 至於 1995 至 1996 年廖朝陽與廖咸浩在《中外文學》的筆戰，邱貴芬評為「是臺灣有史以來有關身分認同在理論層次上，最大規模而且最深入的一場辨證」。<sup>29</sup> 特別是廖朝陽所提出的「空白主體」一說，邱貴芬認為「可以用來做為不同歷史階段臺灣人轉化的認同做註解」，<sup>30</sup> 但是也需要參考意識形態的相關理論才會更加周全。<sup>31</sup> 邱文也回應陳光興以「後國家」概念，主張弱勢國家跨國聯盟的想法，認為陳的左派思想深深威脅了本土運動者，「隱然瓦解了『本土』這個符號的穩定性」，也「促使本土國族運動進一步反思本身權力壓迫結構的問題」，<sup>32</sup> 但是反對陳光興以殖民泛指一切壓迫關係，因而架空了殖民的概念。<sup>33</sup> 邱貴芬的論文不但耙梳了「後」殖民理論在臺灣的演變，更重要的是，她提醒我們不可忽視在西方理論漂洋過海之前，臺灣其實早已擁有本土的後殖民論述傳統，<sup>34</sup> 也以日據時代「臺灣文化協會」分裂的歷史，對照陳光興的左派後殖民論述，做為本土後殖民論述的例證，<sup>35</sup> 並且建議從「縱向的本土歷史脈絡來耙梳後殖民議題的辨證」。<sup>36</sup>

28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66。

29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69。

30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70。

31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71。

32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75。

33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77。

34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61。

35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85-293。

36 邱貴芬：〈「後殖民」的臺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93。

### 三、《看得見的鬼》、《海神家族》 與《婆娑之島》中的殖民經驗再現

邱貴芬與陳芳明強調本土「後」殖民傳統與歷史經驗脈絡的論點大概一致，臺灣複雜的殖民歷史經驗也是我們在研究臺灣「後」殖民文學時不能忽略的物質基礎。本文選擇以二十一世紀的三本臺灣女性小說為例證耙梳臺灣歷史經驗脈絡，嘗試由李昂的《看得見的鬼》、陳玉慧的《海神家族》、以及平路的《婆娑之島》來探討臺灣作家在新世紀如何書寫及反思殖民經驗。三位作者恰好代表三種不同的背景，李昂為出生鹿港的本省世家後代，有著鮮明的獨派色彩；陳玉慧是外省父親與本省母親所產生的所謂「番薯芋頭」；平路則是祖籍山東，長久以來被歸類為「外省作家」。筆者認為，雖然作家的省籍與政治立場以及文學創作並沒有絕對的關係，正如同文學批評者也應該盡可能脫離固著的批判角度，然而不可諱言的是，作者的生命經驗經常可能會影響創作的內容，特別是自傳體的書寫，因此依然可以做為一種參照座標。

更重要的是三本小說分別以女鬼、流浪的臺灣女兒、與荷蘭殖民長官及美國外交官的角度觀看臺灣的殖民歷史，書寫手法殊異，相同的是從女性的立場切入「後」殖民論述，以虛構故事喚起歷史意識，撰寫出具有濃厚國家寓言的故事。陳芳明在〈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代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中指出男女看待歷史有不同的敘述方式：

男性看歷史，都必然是旁徵博引，證據確鑿，這是為了使其建構的歷史知識具有說服力。女性觀察歷史，顯然不在乎時間、人名、地名的準確，她們對於流動於歷史場景中的情感、

情欲、情緒較為重視。男性強調的是國族命脈，女性則偏向個人命運。習慣於中國傳統的歷史書寫方式者，對於大格局、大場面的呈現極為偏愛；相形之下，女性所關心的事實紀錄，不免是屬於小歷史（*petite history*）。<sup>37</sup>

筆者以為本文所要討論的三本小說書寫歷史的方式已經脫離了「小歷史」的範疇，不但有著清晰的地理空間性，而且都具有探究臺灣歷史全貌或是重要時刻的企圖心，以宏觀的角度強調臺灣歷史的獨特性，同時也不忘記從女性私密的角度介入歷史論述，形成公、私交織的歷史書寫。

《看得見的鬼》包括五則短篇故事，分別敘述鹿港東、北、中、南、西的五路女鬼。范銘如在〈另眼相看——當代臺灣的鬼／地方〉一文中討論鬼小說作為當代臺灣文學「一種新形態的地方書寫」，<sup>38</sup>認為李昂這種劃分空間區塊的寫法是「將鹿港變成國域的縮影，……暗寓幾百年來島上幾大區域裡政經文化嬗變下的輾轉」。<sup>39</sup>雖然難以找尋出臺灣不同區塊確切對應的變化，但是李昂刻意以五路表示空間上的無所不包，以五類女鬼的遭遇代表臺灣數百年來的歷史痕跡，卻是不爭之實。

李昂在〈自序〉中表明書寫《看得見的鬼》是為了表達對於臺灣政治前途的憂心。她以島嶼與大國做為兩岸的代號，認為島嶼在2000年政黨輪替結束一黨政治之後，本應歡慶「民主化成功」，

---

<sup>37</sup> 陳芳明：〈挑戰大敘述：後戒嚴時代的女性文學與國家認同〉，《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135-136。

<sup>38</sup> 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臺灣的鬼／地方〉，《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頁86。

<sup>39</sup> 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臺灣的鬼／地方〉，《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頁95。

卻因為政黨惡鬥造成發展停頓，若是喪失經濟優勢，終究「必定回到以往以大國作中心觀點觀之，成為汪洋中一偏遠小島，只是邊陲化外之地，再度淪為『古荒服地』」，因此島嶼將成「……鬼國，既不成國無有疆界；而其曾發過的聲音，既不在大國中心主體之內，只是界外鬼言亂語，亦只成鬼聲啾啾」；<sup>40</sup>自我貶抑／貶異的詞語，充分表達對於臺灣遭到邊緣化的憂心。但是她旋即大聲讚揚在地書寫的充沛能量：「然而即使鬼聲啾啾，無疆鬼國內亦曾有過眾聲喧嘩，鬼趣鬼意豐沛盎然，變化多端、多采多姿，值得大書特書」。<sup>41</sup>〈自序〉中充滿鬥志的修辭，與小說前言中鋪天蓋地的哀愁氛圍——「（鎮日裡，我何以如此的憂傷！）」——形成鮮明的對比，透露了情緒上的巨幅波動，以及意識上的分裂，或許可以稱之為「後」殖民憂鬱症的癥狀之一？

這種意識上的分裂，也展現在女主角分歧的名字上。〈國域之東〉的月珍／月珠、〈國域之中〉的月玄／月紅、〈國域之西〉的月嫦／月娥都是一篇故事具有雙重女主角，彷彿一個女鬼尚不足以道盡種族與階級各異的鬼族故事，必須要以意思極為相近、又極其普遍的臺灣女子名諱來代表島國的諸多鬼靈，烘托出鬼聲啾啾的氣勢。<sup>42</sup>

<sup>40</sup> 李昂：〈自序〉，《看得見的鬼》（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4年），頁8。

<sup>41</sup> 李昂：〈自序〉，《看得見的鬼》，頁8。

<sup>42</sup> 劉亮雅在〈女性、鄉土、國族〉一文中認為李昂在《看得見的鬼》中是使用女鬼為主角，將「女鬼故事新編：看似講古，其實夾議夾敘，參雜著重新想像和推斷，甚至加入了類似從文史專家的角度對此故事傳統的後設思想」。見劉亮雅：〈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九期（2009年），頁22-23。

其中鹿港世家才媛的月玄／月紅更似李昂分身。月玄／月紅在為保家族名聲枉死之後冤魂不散，在終於鼓起勇氣邁出家門之後遇上一街面目不清、身體殘缺的遊魂，月玄／月紅費盡心思才辨認出這些魂魄是反抗清朝的受害者，因而在鹿港著名的「不見天」的木質屋面板書寫自清朝攻佔臺灣兩百一十二年以來，「稱得上『大反』的十八次臺灣人對清廷抗爭」，<sup>43</sup> 而且「專挑大屠殺中各種殘酷事蹟書寫，期能通篇血淚，留下血證」。<sup>44</sup> 她在不見天連接五條路段上方的木屋板上以麻竹與月桃細枝為筆，寫出女子觀點的臺灣歷史，書寫行動長達一百多年。這些滴血的歷史是李昂與月玄／月紅所要共同誌記的喧嘩鬼聲。月玄／月紅本來有要記載同胞抗日事蹟，但是不見天的屋面板已經寫滿，但仍不免感嘆，「所有的人侵者基本上一樣，只消改動人名、地名、發生時間，臺灣人民浴血抗爭清王朝，與對抗異族日人入侵，差別不大」。<sup>45</sup> 在殖民的脈絡下，唐山與日本做為臺灣人民所要對抗的外來統治者，對於守護不見天兩百多年的島嶼才媛而言，並無不同。

筆者以為五則故事中以敘述臺灣原住民的〈國域之東：頂番婆的鬼〉最能代表臺灣原鄉所遭受的殖民創傷，也是最坦白面對臺灣多重殖民歷史的一則故事。故事開始介紹「頂番婆」的由來，講述的就是巴布薩族人遭渡海來臺的漢人逼迫移居至靠山隘口的早期殖民歷史。月珍是巴布薩族與漢人通婚的混血兒，月珠則是荷蘭與原住民「（還可能有漢人血統）」的「紅毛番」。<sup>46</sup> 不論是月珍或是

---

<sup>43</sup> 李昂：〈國域之中：不見天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115。

<sup>44</sup> 李昂：〈國域之中：不見天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117。

<sup>45</sup> 李昂：〈國域之中：不見天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133-134。

<sup>46</sup> 李昂：〈國域之東：頂番婆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13。

月珠都是家族土地被佔、又被強行賣入妓院的孤女。月珍的故事如此：「摔斷腿不能營生的月珍想要回的只是『頂番婆』山邊的一小塊地。漢人阿公給阿嬤招贅，阿公遠房親戚乘家人遷移，認為土地屬於阿公一方，前來強占，不僅將她們趕出來，逼死了癱了的阿嬤，還將她賣到『萬春樓』」。<sup>47</sup> 這一小段敘述道出原住民女性遭受到的種族與性別多重歧視，以及如何受到漢人父權中心主義的茶毒。招贅的阿公親戚以漢人以及男性的威權否定阿嬤的土地所有權，並且逼良為娼，徹底商品化原住民女性的身體。當原住民女性只想要收回失去的土地，卻被清朝的官員當成「平番」的業績，月珍／月珠不抵酷刑，死後還要遭受裸身曝屍的懲罰，以儆效尤。在這則故事中我們看到了墾殖殖民主義者（settler colonizer）與殖民官僚共謀，不但侵佔原住民的土地，並且徹底剝削原住民女性的身體。

李昂素來以情慾書寫著稱，對於女性身體的描述從不避諱，〈國域之東〉關於月珍／月珠所受到的酷刑更是赤裸裸又血淋淋。官員以她娼妓的身分設定刑罰，以羞辱其肉體的方式剝皮、開口、填肉。小說中一開始對於屍身尚未仔細描寫，但是數百年後月珍／月珠被粗鹽存封的屍身偶然被二二八的逃犯發現，當成金身放入小廟膜拜之後，身體終於得以站立，也讓月珍／月珠回憶起生前的遭遇，敘事者這才一一道出種種慘不忍睹的酷刑細節。「全身完好無缺，只於女性性徵上遭到殘酷蹂躪的女子胴體，死後因緣際會不得腐爛，鹽漬封存，鎖住了所有恥辱痕跡，數百年後，一道道，一條條於屍身上清晰顯現」。<sup>48</sup> 月珍／月珠屍體上的「恥辱痕跡」也就是臺灣的殖民痕跡。李昂對於漢人凌虐原住民女性的細細描寫，是刻意要

<sup>47</sup> 李昂：〈國域之東：頂番婆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14。

<sup>48</sup> 李昂：〈國域之東：頂番婆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32。



強調這些難以磨滅的印記。即使屍身受到信徒膜拜，月珍／月珠並無法成神，她的鬼魂需要從父權傳統強加於女性肉體規範的屈辱中釋懷，方得解脫。〈國域之東〉以書寫原住民女性受凌辱的身體，具體表現臺灣原鄉的創傷，生前無法發聲的女子，透過身體的傷口訴怨，成為《看得見的鬼》裡最為醒目的鬼魂。這是當代臺灣主流作家對於原住民的殖民情境最坦白的敘述，也道出臺灣的殖民歷史中最受到忽視的一面。<sup>49</sup>

《海神家族》中也曾短暫出現原住民的元素，但是原住民的元素是用以製造來自琉球的三和綾子是如何因為日本未婚夫死於霧社事件而陷入舉目無親的困境，最後嫁給崇日的「華男」林正男。小說中綾子是第一人稱敘事者的外婆，也是小說中母系家族的源始，她在面臨未婚夫暴力死亡之際，也憶起 1871 年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漁民的牡丹社事件。<sup>50</sup> 原住民反殖民的行動是敘事者家族故事的

---

<sup>49</sup> 即使如此，李昂在書寫漢人欺凌原住民女性時仍然強調是來自唐山的清朝官員之過，在〈國域之中〉一節中特別提到臺灣漢人只能困居海島做「士紳、莊耆」，即使「考上天朝科舉，也會被拒於官宦之途外，不可能被拔擢為有權官職。理因統治島嶼的文武官員，都一定由唐山派任，三年一任、六年一換，早些年還不能攜眷」，見李昂：〈國域之中：不見天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74。月珍／月珠受到急欲建功的清朝官員冤屈凌虐致死，所要報復的對象也只有陷害她的官員。

<sup>50</sup> 陳玉慧：《海神家族》（新北：INK 印刻文學，2004 年），頁 30。劉亮雅在〈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像〉一文中以原住民／南島民族結尾。她承認小說對於臺灣南島民族著墨不多，然而足以提醒讀者「南島民族與閩客、日本人、外省人不同的時間性。尤其霧社事件抵抗殖民統治，在精神上與臺灣人認同有共通處」。將原住民反殖民的行動與「臺灣人認同」畫上等號雖令人不解，但是不到兩頁有關原住民的敘述的確為這本複雜的小說牽引出另一層面。見劉亮雅：〈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動中的國族、族群與性別〉，《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

開端，也是臺灣重要的歷史經驗，但是《海神家族》的焦點是關於遷徙到臺灣的不同族群的故事，包括跨海而來的神祇。

相對於李昂的「鬼國」，陳玉慧在《海神家族》裡建構了一個在神明精神力量庇佑之下歷經風霜的家族與國族故事，其中媽祖與祂的部將千里眼與順風耳更是最重要的神祇。小說的英文書名直譯是《媽祖的保鏢》（*Mazu's Bodyguards*），小說最後一章稱為〈媽祖回到祂的「保鏢」身邊〉，說出小說以神祇的重逢作為家族重聚的代表，因為不同的個人與歷史經驗而遭到撕裂的家族終於有了大和解以及新成員。敘事者在小說開始感謝千里眼與順風耳這兩位「媽祖的保鏢」幫助她充新找回家，重新回到出生之地，「那個叫臺灣的島」；<sup>51</sup> 小說結尾時她則感謝這兩位保鏢替她牽引了異國的姻緣，「而媽祖呢？祂看著這個家庭，成員的消長和分離，情感的毀滅和重生。媽祖當年從福建跨海渡洋而來，祂忍受過多少次海難與颱風，祂聽過多少次死亡對人的召喚，祂一直是苦難者的救護，祂怎麼會拋棄我們呢？」。<sup>52</sup> 敘事者與她的家族成員都信仰媽祖這個「有無比精神能量的老靈魂」，<sup>53</sup> 因而名為「海神家族」。但是每個家人信奉的媽祖並不全然一致。綾子嫁到臺灣跟隨婆婆祭拜媽祖，她把媽祖當成琉球的「姊妹神」，「她相信媽祖便是姊妹神，或是姊妹神的姊妹，她們都是權威至上的海神」。<sup>54</sup> 對於暗戀嫂嫂的林秩男，綾子便是媽祖的化身，所以「他的媽祖乍看有點像綾

---

小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頁 265。

51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8。

52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313。

53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314。

54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37。

子」。<sup>55</sup> 因此，即便是神祇，也因為不同信徒的個人經驗與欲望而有了不同的詮釋。

就像李昂的「鬼國」裡都是人事，陳玉慧的「海神家族」記載也都是家族中不同成員在人海浮沉的故事。《海神家族》是一本「後」殖民小說，因為它記述了臺灣從日據時代到二十一世紀三代的家族故事。不僅包含臺灣人在日本殖民時期受到歧視與利用，也深刻地描寫了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代的「再殖民」壓迫，對象既是「本省人」，也有「外省人」。劉亮雅認為「戒嚴時代的『中華民國』一如日本帝國，都強調單一同質的國家時間，壓迫文化上的弱勢族群，抹煞他們的時間性」。<sup>56</sup> 而《海神家族》就是試圖在敘事者回顧家族歷史之際，挖掘出臺灣層層堆疊的時間性，甚至透過綾子的出身，觸及琉球被日本殖民的歷史。綾子將媽祖當成姊妹神的化身，也提到琉球人民信仰風獅爺的習俗，證明琉球與臺灣歷史上的關聯性，只是比臺灣早一步日本侵占、殖民。<sup>57</sup> 因此，《海神家族》是一本敘述受到多重殖民創傷的家庭，而這個家族的故事也是臺灣的故事。

敘事者因為想要離開充滿秘密、被人詛咒、唾棄的家離鄉背井近二十年，小說描寫她在飛機即將降落臺灣之際察覺到記憶的甦醒，所用的比喻是「記憶像個長期昏迷不醒的病人突然清醒過

---

<sup>55</sup>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114。

<sup>56</sup> 劉亮雅：〈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動中的國族、族群與性別〉，《遲來的後殖民》，頁 248。

<sup>57</sup> 綾子在提到姊妹神時想到父親不信姊妹神而遭海難，「父親和舅舅只祈拜風獅爺，認為風獅爺可以避風祛災、帶來財富，她在臺灣的廟裡也看過風獅爺」。見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30。

來」。<sup>58</sup> 記憶的回返，也代表著與創傷經驗的重逢。敘事者的複雜家庭背景——曾祖父是蒙古人，祖父與父親在北京出生之後移居安徽，外婆是日本人，而外公是福建來的臺灣人——在機場服務的計程車司機約化的邏輯處理之後，製訂了她的身分標籤：「你的父親應該算是北平人，你不是臺灣人，你是外省人」。<sup>59</sup> 剛下飛機的敘事者立刻被拋進靜止、甚至倒退的歷史地理之中，回到蔣介石時代的「北平」，回到「外省人」的子女仍然不是「臺灣人」的時空。劉亮雅認為多重殖民會造成「不同時間性（temporalities）的交錯駁雜」，對她而言，「《海神家族》既是臺灣國家寓言，也是對全球化跨國流動的思索。一方面它強調臺灣國家認同。另一方面，國家並非同質的，而是含納不同種族、階級、性別位置，甚至於不同族群身上銘刻了不同國家認同的時間性」。<sup>60</sup> 這個論點基本上正確，但是更複雜的層面是不同的讀者看到的時間性、乃至於對時間性的詮釋也不一。而且不同的時間性交錯之際有時會造成時間的停滯，甚至倒退。如劉亮雅所言，「北平」地名是蔣介石時代地理歷史教育偏差的遺緒。<sup>61</sup> 但是小說中使用「北平人」這個標籤的是臺籍司機，這一幕訴說的是他如何因為歷史因素也成為退化性時間的共謀者。

陳玉慧在敘述這個「後」殖民的故事時，採用了跨國的框架，從敘事者與德籍男友返臺追溯家族故事開始，最後在臺結婚，為因

---

<sup>58</sup>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9。

<sup>59</sup>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10。

<sup>60</sup> 劉亮雅：〈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動中的國族、族群與性別〉，《遲來的後殖民》，頁 238。

<sup>61</sup> 劉亮雅：〈陳玉慧《海神家族》裡的另類歷史想像：跨國流動中的國族、族群與性別〉，《遲來的後殖民》，頁 241-242。

為日中跨國婚姻、「本省」與「外省」通婚而開始的家族，又添加了一段跨亞歐種族的姻緣，某種程度上搬演著家族歷史的重複性，只是因為不同的時空背景而造成不同的婚姻組合。陳玉慧也使用了後現代的拼貼手法，在家族成員的故事之間穿插了八段臺灣民間信風俗的介紹，從「拜天公需知」、「喪禮需知」、「拜地官需知」、「拜七娘媽需知」、「安太歲需知」、「媽祖遶境或進香需知」、「婚禮需知」、到「出生禮需知」。家族故事與臺灣民俗介紹的文字之間內容互相呼應，例如「拜七娘媽需知」之前，敘事者的母親靜子將被大陸親人欺騙、拋棄的父親二馬接回臺灣照料，對於二馬一再的背棄心中充滿「悲哀憤恨」，期願來生不要做女人，更不要再認識二馬。<sup>62</sup> 文本緊接著介紹如何祭拜七娘媽或是七仙女，更特別強調「七夕是婦女最重要的祭拜節日」。<sup>63</sup> 彷彿暗示讀者要誠心祭拜七娘媽，方可避免靜子這樣悲慘的婚姻。在描述二馬在保安司令部受到酷刑並因「知匪不報，被判五年徒刑」之後，<sup>64</sup> 作者提供的是「安太歲需知」，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推薦驅吉避凶的撇步。這些民間習俗穿插在小說敘事之間，除了強化文本的「臺灣性」，也有為國際讀者介紹臺灣之意，亦即陳玉慧在書寫小說時已經有國際出版的規劃，為小說增添了文本之外的離散性。<sup>65</sup>

筆者認為陳玉慧所要強調的是離散移徙的路徑（routes）所衍生出來的多重紮根（roots）。陳玉慧在與丈夫明夏（Michael Cornelius）的訪談中稱《海神家族》融合了她自己的家族往事與虛構故事：

62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169。

63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171。

64 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221。

65 根據小說封面的介紹，《海神家族》的德文版在德國頗受好評。

是一個混合式的自傳體，個人與家的故事平行發展，是我的逆向旅途，或者可說是我的回溯之旅。我年輕時急於離開家和臺灣，我在小說中檢視過去的斷絕，且意識到自己與臺灣勢必無法分割。……與我的生命關連便在於，我是從幻滅出發，個人家國情調幾乎已底定，我常在懷疑，但我無需懷疑，像我這樣的人便是臺灣人。<sup>66</sup>

即使複雜的家庭與族裔背景曾經驅使敘事者／陳玉慧離鄉漂泊，在為家族進行全面性的記憶回顧之後，終於能夠確認自己的國家認同。在海神及其部將的庇佑之下，敘事者、乃至於作者脫離了「外省人」標籤與限制，成為一個真正的臺灣人。

平路的《婆娑之島》也有位原住民女性，但是在小說中西拉雅（Siraya）族人娜娜並沒有敘事聲音，只存活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駐派臺灣的最後一任行政長官揆一（Frederic Coyett）的回憶之中。<sup>67</sup>連雅堂在《臺灣通史》自序文末形容臺灣是「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小說的書名串接了連橫傳世的字句，宣告以小說為臺灣立史的宏大企圖。但是，作為書寫臺灣的小說，《婆娑之島》卻沒有臺灣在地人的聲音，而是透過異國男性回憶臺灣歷史。小說的序言——「追懷過去／紀念我們的時代／並惋惜島嶼一再陷入的夾縫」——正是為臺灣的命運一嘆。但是在小說文本中發出嘆息的卻是帝國的男性：祖籍瑞典的荷蘭官員揆一與不具名的美國官員生命故事相差了三百年，共同點是都因為臺灣背負了叛國罪名，「都是

<sup>66</sup> 明夏：〈丈夫以前是妻子——評論家丈夫明夏專訪小說家妻子陳玉慧〉，《海神家族》，頁 327。

<sup>67</sup> 西拉雅人為臺灣南部的平埔族，是平埔族人口最多的一支，已經是與漢人接觸混種之後的熟番。

為了臺灣下獄的白種男人」。<sup>68</sup>《婆娑之島》中交叉出現的敘事碎片的是他們的懺情記，也是為自我清白的辯護，更是拼湊臺灣歷史的重要線索。陳芳明在小說的推薦文中指出女性在《婆娑之島》扮演著寓言臺灣的角色：「臺灣是女性，這已是許多論述中普遍的講法。但是如何賦予女性恰如其分的血肉，正是文學想像所要追逐的目標。平路的小說，便是擔負著如此的任務」。<sup>69</sup>平路的巧思就在於將臺灣的歷史鑲嵌於帝國男性的答辯之中，同時讓讀者看到帝國殖民論述的歐美中心與父權想像。

做為女性書寫，《婆娑之島》的女性角色看似無聲。不論是揆一日思夜想的娜娜，或是不具名的美國國務院高官所思慕的代號「羅洛萊」（Lorelei）的臺灣女孩，在小說中都沒有自己的敘事聲音，似乎只是遲暮的異國男性思考與臺灣關係之間的中介。<sup>70</sup>然而做為書寫歷史的小說，女性聲音的缺席恰可突顯歷史國族的大論述中女性一貫的沉寂。在《婆娑之島》中，不論是在十七世紀統治南臺灣的荷蘭海權帝國，或是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以政經文化力量左右臺灣局勢的美國霸權帝國，在平路筆下都是殖民延續體的一部分。而近五百年來持續在新舊殖民勢力交替侵占的夾縫中存活的臺灣，始終扮演沉默但關鍵性的角色。

平路特別強調島嶼具有難以降服的自主性，在殖民者的論述中插入反殖民的訊息。在揆一回憶中，濃綠地讓他透不過氣的島嶼也令他心生警惕：

---

<sup>68</sup> 平路：《婆娑之島》（臺北：商周出版社，2012年），頁231。

<sup>69</sup> 陳芳明：〈帝國與人性〉，《婆娑之島》，頁28。

<sup>70</sup> 美國國務院高官的原型是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前美國首席副助理國務卿凱澤（Ronald Keyser），他在2004年因涉嫌洩密給臺灣駐美外交人員被捕。

白雲在天際飄，山峰插在雲裡，河流像蜿蜒的飄帶，熱帶暮色下閃爍為光的海岸線。複雜的地形像一座迷宮，足以讓外來的統治者迷途，讓外來者走不出去。

他依稀記得那個隱喻，是警告嗎？替這島嶼命名的葡萄牙水手，風浪中撞上暗礁，回航的船隻擱淺，困在沙洲上找不到歸路。<sup>71</sup>

迷宮的隱喻更確定了小說的反殖民寓言性。美麗之島也有危險又叫人捉摸不定的一面，讓「外來的統治者」意亂神迷而身陷其中，絕對不是默默承受侵犯的柔弱女性。

揆一的荷蘭殖民故事是一般讀者所不熟悉的歷史過去。暮年的揆一在阿姆斯特丹一面書寫著一封封想要呈給「奧倫治威廉三世親王殿下」的書信，一方面為自己失去福爾摩沙的罪狀辯護，另一方面則要強調臺灣的重要性，反控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巴達維亞評議會失職，貽誤了帝國的戰略先機，拱手將臺灣讓給了國姓爺鄭成功。但是揆一的信件注定是無法寄出，因為他「必須封口，不能吐露當年發生的事，那是恩准他從流放之島回到阿姆斯特丹的條件」，<sup>72</sup>自然也不可能上書親王為自己辯護。歷史學家認為揆一及其部屬化名 C.E.S. (Coyett et Socii) 搶在 1675 年揆一回到荷蘭之前，出版了《被貽誤的臺灣》(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 一書為自己所受到的控訴辯護。<sup>73</sup>《婆娑之島》相關的歷史資料也顯然多方參考此書。除了書寫訴願信為自己辯護，揆一的清醒時刻都用在「回想福爾摩

<sup>71</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107。

<sup>72</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190。

<sup>73</sup> 周俊男：〈C.E.S. 著《被貽誤的臺灣》漢譯版編後記〉，收入林野文譯：《被貽誤的臺灣》（臺北：前衛出版社，2011），頁 240。



沙那溫柔的海岸」，<sup>74</sup> 以及熱蘭遮城（Zeelandia）的圍城經驗。他的「暮年歲月最感慨的一件事」，就是「這麼多年，那個島總是陷入夾縫」。<sup>75</sup> 揆一感嘆的是荷蘭勢力撤出之後臺灣在世界貿易的地位迅速沒落，榮景不在；也在感嘆經歷過鄭荷之戰後，臺灣又陷入明鄭與滿清帝國的爭戰。書末全知的敘事者提到揆一沒有料到的是後世對他獻城史事依然多有誤解，「受降的各種示意圖中，他或在國姓爺面前謙卑下跪，或在遞降書時低頭悔過」，<sup>76</sup> 彷彿不勝唏噓。平路重寫揆一的故事，也意在穿越時空為他平反這「無從否認的冤錯」。<sup>77</sup>

揆一清醒的時刻念茲在茲是臺灣的政治；午夜夢迴，他思念的是「娜娜，這唯一的名字，他不能在清醒的時候寫在紙上」。<sup>78</sup> 這個不能夠出現在呈交給帝國文件中的名字屬於夢境，也屬於重返青春的時刻。揆一在「夢囈中呼喊娜娜的名字，這個甜蜜的名字連起他對島嶼的牽憶，他益發想念那段精力旺盛的時光」。<sup>79</sup> 他們在1659年的偶遇，令揆一想起少年時代在斯德哥爾摩看到探險書插畫中的熱帶女子引發了「心中不可言說的燥熱」；因為娜娜而勾起的激情欲望，讓我不禁自問：「或者這是每個文明人的夢想？」，<sup>80</sup> 他沾沾自喜的刻板印象卻道出平路對於白種殖民者的反諷。娜娜熱情投懷送抱，彷彿真的是「文明人」的夢想成真，讓喪妻之後續絃

---

<sup>74</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58。

<sup>75</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75。

<sup>76</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285。

<sup>77</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285。

<sup>78</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110。

<sup>79</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119。

<sup>80</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158。

卻不舉的揆一重拾雄風，放下行政長官的身分與她野外幽會。但是娜娜卻不是他能夠掌握的性愛工具，反而有如擁有魔法，讓揆一感覺到「每一樣娜娜碰到的東西，似乎閃著亮光，富含他無能理解的神秘力量」。<sup>81</sup> 在他的圍城回憶中，在烏特勒茲堡遭國姓爺軍隊夷平的前一夜，曾經聽到動人的月夜歌聲，讓他忘記即將兵臨城下的危險。揆一反覆自問：「是娜娜在城下唱歌嗎？難道她已經知道，熱蘭遮堡的歲月即將走到盡頭？這麼快，一切都要結束了」。<sup>82</sup> 娜娜總是在揆一危急的時刻出現，初次相遇時救他於溺斃，又以歌聲預示帝國統治的盡頭。娜娜的「神秘力量」可能是揆一對於原住民女性的另一種刻板印象，但是筆者以為更積極的讀法，是將與自然界關係密切的娜娜視為臺灣島原初的母性力量，以強大的精神能量保護島嶼。

小說中巧妙地以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allusion*）連結了揆一與美國官員的故事。出獄後的美國官員回想駐守時臺灣曾看到一本荷蘭末代總督暗藏對於臺灣深情告白的書，不禁感嘆「什麼情況之下，曾經與臺灣命運交叉的外國人，必須以匿名的方式才能夠寫出對島嶼的真心？」。<sup>83</sup> 他在美國的書店遍尋該書不得，只看到署名 C.E.S. 的書，但是這本政治答辯兼介紹風土人情的政治的書顯然不是他「記憶裡的那一本抒情的書」，因而懷疑自己的記憶是否可信。<sup>84</sup> 或許平路在小說中植入了對於自己小說的後設性指涉。更重要的是她對於記憶的質疑，彷彿是自我解構了這部植基在回憶之上

---

81 平路：《婆娑之島》，頁 265。

82 平路：《婆娑之島》，頁 118。

83 平路：《婆娑之島》，頁 230。

84 平路：《婆娑之島》，頁 232。

的小說，也在小說尾聲植下一個危機信號。如果沒有了記憶，這兩位前帝國官員又剩下什麼？而虛構的記憶之書又能表達多少史實？平路無意多就此點著墨，但是讀者卻不得不思索這個極其重要的記憶問題。

美國官員是因為提供臺灣駐外單位資料而被指控背叛國家。揆一藉由書寫寄不出的信函為自己辯護，缺乏正式答辯的機會。現代的美國官員則經歷了多場法庭攻防戰，也讓作者藉機發抒美國背棄臺灣與中國建交的怨氣。例如美國官員提到外交圈特殊的道德標準，「若以『背叛』這個詞來界定，在與臺灣的關係裡，美國外交領域的教父，那位季辛吉曾經做出最卑劣的示範」；<sup>85</sup> 正因為美國之前背叛臺灣，「關係裡曾經充滿欺瞞」，才會認為他洩漏國家機密。<sup>86</sup> 他對於羅洛萊的迷戀，不僅是對青春生命的嚮往，更有「移情」作用，將自己對臺灣的同情與「本身的青春記憶」都轉移到臺灣女孩身上。<sup>87</sup> 曾經暗中幫助臺灣反對黨傳遞消息的美國官員，深深受到羅洛萊心念臺灣所感動：「在複雜的世界裡，女孩唯一的參考座標總是臺灣。無論臺灣多麼小、多麼無足輕重，那是她心裡唯一的記掛」。<sup>88</sup> 羅洛萊的出現讓他的人生「重新連貫起來」，<sup>89</sup> 幫助女孩也就是他「人生最後的奮起」，<sup>90</sup> 因此一無反顧。小說中美國官員與羅洛萊的交往沒有肉慾的描寫，卻滿是政治牽掛，富涵政治寓意。

然而，平路並未忽略美國官員對於羅洛萊的愛戀也是發自於男

<sup>85</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72。

<sup>86</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79。

<sup>87</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164。

<sup>88</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197。

<sup>89</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232。

<sup>90</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233。

性中心、強者作風的保護主義。在深信南方騎士精神，<sup>91</sup> 抱持著保護弱者心態的美國官員心中，「羅洛萊就像那個多颱風多地震的島嶼，那麼小，那麼沒有抵禦能力……是個需要被人保護的東西」。<sup>92</sup> 此處美國官員直接將女孩與臺灣畫上等號，看似愛憐卻極為貶抑，充滿白人男性的優越感，也顯示臺美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另一方面，平路也藉由美國官員之口說出她對於臺灣認同的看法：

亟於證明存在的正當性，臺灣人有嚴重的身分焦慮！

所以，他想著，或者該怪臺灣，總喜歡把本身放在亟待被保護的弱勢位置。<sup>93</sup>

缺乏國際社會的認同使得臺灣的國際政策荒腔走板。而臺灣「總是被人貽誤」、「一再陷入夾縫」的原因，是因為地理位置與歷史宿命，而在中國近代受到西方壓迫，「自尊飽受摧殘」，因此難以持平面對臺灣問題，更無法逃離集體化的國族主義，放棄臺灣這「中國主權完整之前的最後一塊缺角」。<sup>94</sup> 島嶼既然無法像羅洛萊的童話故事裡面那樣「漂流到自由而廣大的海域，與大陸遠隔重洋」，<sup>95</sup> 又要如何自由自在、婆娑起舞？小說沒有提供答案，只留給讀者許多思考的問題。

小說留給讀者最大的問題還是女性角色。吳叡人認為娜娜及羅洛萊「象徵兩個時代的島嶼」，娜娜充滿野性，主動追求愛情，羅洛萊卻缺乏主動性。<sup>96</sup> 如果要賦予羅洛萊寓言式的反殖民力量，讓

91 平路：《婆娑之島》，頁 200。

92 平路：《婆娑之島》，頁 247；刪節號來自原文。

93 平路：《婆娑之島》，頁 260。

94 平路：《婆娑之島》，頁 261。

95 平路：《婆娑之島》，頁 261。

96 吳叡人：〈命運之書〉，《婆娑之島》，頁 11。

她變成可以引誘水手的賽蓮（Siren），「我們還需要行動——小說之中的行動（action in fiction），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另一段敘事，另一段文本，從那看似安靜柔順的羅洛萊的主體觀點，敘述她眼中愚蠢傲慢的男性／帝國……以及複雜纖細心思底下，他對祖先娜娜的記憶，有關對生命與自由的愛戀」。<sup>97</sup> 陳芳明也認為「平路形塑出來的臺灣女性，好像在歷史上發揮不了作用。她雲淡風清的文字，竟然擊中帝國最不堪的一面。那種毀滅之美，或許還可以寫得更加放膽，更加殘酷，更加不留情」。<sup>98</sup> 不論是海涅（Heine）筆下在萊因河以歌聲誘人而導致船難的羅洛萊，或是荷馬史詩中以歌聲致命的賽蓮，都看似與小說中沉默的女性角色形成鮮明的對比。但是臺灣女性真的「在歷史上發揮不了作用」嗎？筆者認為平路最終是以原住民女性的精神力量做為臺灣的「原神」，而不是誤入政治叢林的小白兔臺灣羅洛萊。神出鬼沒的娜娜以歌聲揮別帝國情郎，她或許不像揆一夢中的原住民女巫師那般嚴厲，嚇斥「紅毛賊」滾出「祖靈的地方」，但是仍然足以讓揆一這「外來者」覺悟到「轉了一圈，留下些微遺痕，島嶼終有它本身壯闊的生命。……所有人都應該讀到這樣的警語，福爾摩沙是娜娜族人的地方！」。<sup>99</sup> 平路語重心長，透過前帝國官員揆一說出的覺悟，也正是臺灣後殖民研究必須謹記在心的「警語」。透過不斷回憶獨白的男性聲音，平路在《婆娑之島》中一方面反諷帝國官員難脫殖民心態又過度情感投射，另一方面其實對兩位白人男性仍抱著同情之心，因此平路對於帝國的「毀滅之美」仍然手下留情。《婆娑之島》內省式又深入人性的書寫策略，顯示後殖民文學不必一定要針鋒相對，也依然能夠

<sup>97</sup> 吳叡人：〈命運之書〉，《婆娑之島》，頁 13。

<sup>98</sup> 陳芳明：〈帝國與人性〉，《婆娑之島》，頁 28-29。

<sup>99</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266；標楷體為筆者所加。

具有反殖民的力量。

#### 四、小結

月珍／月珠最後魂身化為光焰散去；月玄／月紅則與「不見天」合一，「安然放下」，<sup>100</sup> 等待黎明的到來與即將拆除的鹿港老街共存亡；月嫦／月娥則與飛機共同飛升，翱翔於天地之間。除了傳說中的林投姊，李昂筆下的女鬼們最終都放下執念，尋找到自己的解脫之道。《海神家族》中敘事者的母親與阿姨、以及敘事者與父親都得到和解，在媽祖與部將神像重逢、婚禮以及家族合葬的儀式中結束。《婆娑之島》裡的兩位白人帝國官員經過懺情回顧，揆一寫完死前「最後一封寄不出的信」，<sup>101</sup> 生平留待歷史蓋棺定論；美國高官則結束與羅洛萊的最後會面，正要遭到聯邦調查局拘捕，敘事時間停止在外交事件開始的那一刻。無論是民間傳奇式的鬼靈敘事，或是後現代拼貼式的家族集體敘事，亦或是跨越時空的虛構回憶錄，三位作家皆表達對於臺灣這美麗之島的全心認同，對於臺灣殖民歷史的深切關注，也各自表述自己的「後」殖民立場。綜言之，經過二十世紀末以來理論的激烈辯證，臺灣的「後」殖民論述已經發展出自己的脈絡，而臺灣作家也持續以豐富的文學創作，建構出具有臺灣歷史地理文化獨特性的「後」殖民傳統。本文僅以三部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女性小說做為初探，期待創造能量不斷，尤其是原住民作家的介入，使得臺灣本土的「後」殖民傳統能夠更加充滿活力。<sup>102</sup>

<sup>100</sup> 李昂：〈國域之中：不見天的鬼〉，《看得見的鬼》，頁 143。

<sup>101</sup> 平路：《婆娑之島》，頁 284。

<sup>102</sup> 原住民女作家也有不少創作，例如里慕依·阿紀《山櫻花的故鄉》（2010）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平路：《婆娑之島》，臺北：商周出版社，2012年。
2. 吳叡人：〈命運之書〉，收入平路：《婆娑之島》，臺北：商周出版社，2012年。
3. 李昂：《看得見的鬼》，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4年。
4. 周俊男：〈C.E.S. 著《被貽誤的臺灣》漢譯版編後記〉，收入林野文譯：《被貽誤的臺灣》，臺北：前衛出版社，2011年。
5. 明夏（Michael Cornelius），陳玉慧譯：〈丈夫以前是妻子——評論家丈夫明夏專訪小說家妻子陳玉慧〉，《海神家族》，新北：INK 印刻文學，2004年。
6.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7. 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臺灣的鬼／地方〉，《文學地理：臺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
8. 陳玉慧：《海神家族》，新北：INK 印刻文學，2004年。
9. 陳芳明：〈帝國與人性〉，收入平路：《婆娑之島》，臺北：商周出版社，2012年。
10. 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11. 劉亮雅：《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

即是第一部泰雅族的長篇小說，記述一個原住民家族南遷的故事。文本限於篇幅無法處理，將另文研究。

12. 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臺灣小說專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

## 二、期刊論文

1. 劉亮雅：〈女性、鄉土、國族——以賴香吟的〈島〉與〈熱蘭遮〉以及李昂的《看得見的鬼》為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九期（2009 年），頁 7-36。
2. Liao, Ping-hui.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aiwan: Issues in Critical Debates." *Postcolonial Studies* 2.2 (1999), pp. 199-211.
3. Liu, Liang-ya. "Taiwanese Postcolonial Fiction." *PMLA* 126.3 (2011), pp. 678-684.